

包達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十冊

——
俄帝之侵略

正中書局印行

包遵彭
李定一
吳相湘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十一輯

——
俄帝之侵略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臺二版

第一輯
第十冊

俄帝之侵略

全一冊 基本定價壹元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包李吳

發行人

蔣

發行所

正中

印刷所

正中

海外總經理

集成圖書公司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遵定相建

書書

彭一湘白局局

(3926)

內政部登記證 內警嘉業字第一〇四號

臺·上

2/1./2.

叙 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鵠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擾難紬繹的原因而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爲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蒐輯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贋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果，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爲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遭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爲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共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贗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

面輯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椿例證，更加強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為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作透澈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輿論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 例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導 論

在「早期的中外關係」中（「論叢」第一輯第三冊），我們曾經指陳：一六七〇年俄國就有征服中國的狂妄企圖。一八五八——六〇年是俄人進行征服中國積極行動的正式表面化；同時也是近百年來俄人應用「偽裝友好藉指責他人以掩飾其本身侵略」策略的最初範型——在這一冊內，我們要進一步指陳：沙俄蘇俄侵略中國的一貫傳統。換句話說，就是近三百年來的歷史證明，不論俄國內部當政人物如何變化，其征服中國的最後目標是始終沒有改變的，而其為達到這一目標所用的策略手段則青出於藍勝於藍，更變本加厲了。

早在一八五三年，俄人開始積極東侵時，馬克斯即曾於紐約論壇報討論「東方問題」論文中揭穿俄人陰謀，大聲疾呼「遏止俄國兼併計劃實在是最為重要的事」。其後一八五八年馬克斯、恩格斯為同一報紙所撰的「中英條約」及「俄國在遠東之成功」論文中，一方面指出當時英法聯軍的「對華作戰竟成為祇是爲了俄國的利益」。「俄國卻乘機向中國攫奪而積等於法德兩國的領土，同時還狡猾地出來充當衰弱的中國底公正保護者」。一方面更提醒世人：俄國這一利用英法行動的結果，已使它由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進到溫帶，「這樣獲得的戰略陣地，對於亞洲的重要，正和波蘭對於歐洲的重要一樣。土耳其斯坦的占領足以威脅印度，東三省的占領足以威脅中國；而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和印度，現

時是亞洲有決定意義的國家」。這些話，多像現代人的口吻！不幸英國日本始終沒有真誠致力於改善對中國的關係，日本且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以致沙俄更得賣弄「友好」笑臉的機會，繼續向中國擴張（參見第一輯第六冊「第一次中日戰爭」）。而一八九八年以後，俄國境內受瘋狂的大斯拉夫主義哲學家影響的知識份子，卻已假藉馬克斯主義的旗幟，開始援引馬克斯的觀點以檢討對中國問題了。一九一三年三月列寧的「馬克斯學說底歷史命運」和一九一八年史達林的「不要忘記東方」論文，可以說是其代表作。

列寧曾教訓其黨徒：對於鬥爭的方式策略，要無條件地注意向歷史中去尋求。莫洛托夫在頌揚史達林七十生日時更指出：蘇俄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成功，史達林對於各國歷史的深遠知識，是具有決定性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二百年來，俄國侵略中國的歷史非常明白顯示：「偽裝友好藉指責他人以掩飾其本身侵略」的策略是會導致意外巨大成果的；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國民革命思想洋溢全國，一般中國人的知識較前大有進步，事實上已不可能完全應用沙俄愚弄滿清朝野的手段了。因之，將這一策略和列寧所謂「根據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引導羣衆到『革命』來」的策略相互糅合運用，即成爲近四十年來俄人侵華策略的最高原則。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很顯明地表示出中國國民在痛恨日本侵略之餘，對於歐美各國的希望心忍耐力也開始趨於動搖了。一向認定中國是帝國主義鎖鍊較弱和施行「革命征服」最易地方的列寧、史達林當然不會放鬆這一難得的機會，因此，七月二十五日即以蘇俄政府名義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在這一充滿挑撥煽惑和甜言蜜語的文件中，不僅和沙俄一樣咒罵英日法美的侵

華行爲，並且還變本加厲學着馬克斯口吻痛責沙俄！申明願意放棄沙俄時代侵略中國所得的若干權益！「收回外國在華特權」原是五四運動的目標，現在蘇俄宣言的發佈，不正是「根據羣衆自己的政治經驗」嗎？新策略的第一步既已顯示，其第二步也就緊接著展開了：這就是民國九年春，俄其代表吳廷康（維丁斯基 V. Otsinsky）在上海策動並資助成立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至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俄寇「引導羣衆到『革命』來」的新策略基礎即告奠定。

按革命一詞，在我國書籍中首先見於易革：「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孫中山先生曾再三援引此語，指出「革命之意義大矣哉」。並且強調說明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就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爲愛人民而發動的革命——在另一方面，中山先生更本其多次環遊世界研究各種革命理論與各國實際情況的經驗，再四鄭重指出馬克斯階級鬥爭世界革命說法之謬誤。例如民國元年四月以「實行社會革命」爲題的演講中即斷然指出：「中國社會革命不必用武力」。「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民國八年在三民主義手寫本中，反覆引證歐美勞資衝突及俄國共黨暴動（一九一七年十月）事實後，更明白申稱：「我當懷歐美前車既覆之鑒，爲我之曲突徙薪，不可學俄人之焦頭爛額也。夫惟我之資本尙未發生也，則我防患於未然自易，此中國之後來居上，將必爲世界第一富強安樂之邦之大希望也」。在在說明中山先生對於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自有我民族傳統一貫的神聖界說，是與馬克斯製造階級鬥爭掀起所謂世界革命的謬論絕不可同日語的。

然而假藉馬克斯主義旗幟的俄國共產黨人，竟利用馬克斯所謂「工人無祖國」而造出「蘇俄全無產

階級祖國」的謬論。史達林更由此對「革命」與「反革命」作一荒謬絕倫的界說——「誰無保留地，無條件地，公開和忠實地，並不必要秘密軍事會議地去準備保衛和守衛蘇聯，則誰就是革命者」。「誰想保衛世界革命運動而越過或反對蘇聯，則誰就會走向反對革命，必然溜入革命敵人的陣營」——這一謬論，實在是侮辱革命的神聖意義。然而近四十餘年來世界各地共黨——尤其中共匪徒多少賣國殃民的罪惡，都是在史達林指令之下假「革命」之名以行的！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赫魯雪夫貶責史達林演詞中，著重指出史達林任意創造名詞加以利用，「從事破壞各種合法的革命」。於是俄共假「革命」之名以行征服世界奴役人類大陰謀的真相更暴露無遺了。

赫魯雪夫之貶責史達林，完全與史達林過去咒罵沙皇一樣，是企圖藉此將罪惡推之於死人，以緩和並鬆懈自由世界人士對其詭譎行徑的注視，然後乘隙再進一步以達成其征服全球奴役人類的陰謀。用最淺顯地譬喻說：俄人的用意完全是如民間發現竊賊時強盜的詭計一樣——後走的賊夥跟著前行的賊夥跑，口中卻高呼「捉賊」「捉賊」，以掩飾身份乘機席捲財物而去（俄共托洛斯基之妻最近在美即作此相同比喻以說明赫魯雪夫貶史運動之意義）。

說明這一論據的最佳例證，就是史達林在第二次大戰中所用以攫取我東北的事實。

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印行史達林審定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讀本」中文本第三章中，曾詳細說明沙俄侵奪中國東北是「強盜行為」。對於一九〇四年俄日因爭奪我東北及朝鮮而發生的戰爭，更指出「俄國民衆不願意這個戰爭，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則認為沙皇政府在這個掠奪戰爭中的失敗是有益的」。然而

就是這一會咒罵沙皇的史達林竟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雅爾達會議中公然要求「因日本在一九〇四年之侵攻而被攫奪之俄國原享權益應予恢復」！

史達林之所以毫不紅臉地固執前發言的矛盾，公然以「掠奪戰爭」「強盜行爲」是它「原享權益」，很明顯地自供出強盜世家的歷史淵源；主要地是它已經應用各國共黨腐蝕各國人心淆亂各國朝野對其真面目的認識了。換句話說，「聯共黨史」的咒罵沙俄就是賊夥口中「捉賊」「捉賊」的喊聲，當自由世界誤以它是「好人」，願意和它「坐下來談談」的時候，它的非法行動即因此獲得合法掩護，當然更助長其野心，就公然以前奔賊夥遺留的贓物爲其原享利益來試探對方的反應了。而當自由世界又誤認它的「建議似乎很合理，他們僅僅祇想把從他們手裏拿出去的東西拿回來」，並且簽署文書證明時（雅爾達協定）就更使其毫無忌憚了。由是霸占中國東北、侵據中國大陸、發動侵韓戰爭，一幕一幕演出；同時更大事宣傳「中蘇友好」，「俄羅斯民族偉大」，並驅使其第五縱隊——共匪應用種種殘酷方法迫使我同胞強顏事仇認賊作父，以便更進一步消滅中華民族文化，永遠淪中華民族爲其奴隸。

俄人進行的這一陰謀，是經過長期設計並有其廣大規模以逐步推行的。其中對於我中華民族歷史的改寫，史實的歪曲，是非的顛倒，更是達成這一陰謀最後階段的重要工作。因之，多少年來俄寇共匪於此都是特別注意的，尤其是近年來共匪更假藉印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名，以行摺燬俄寇侵華史料之實的行動。試看這些「資料叢刊」或共匪區印行的任何一種「中國近代史」中何曾有提到瑗瑋條約、北京條約俄人侵奪我東北大地土地的事實！同治光緒間俄人占領我伊犁，原是俄人企圖攫奪我新疆積

極行動的表面化，但在這些「資料叢刊」或現在大陸印行的其他「中國近代史」中也被輕描淡寫過去了——而這「輕描淡寫」卻不是無意的「偏差」，正是有意的「伏筆」。試看一九五四年三月共匪「人民出版社」刊行的「爲正確闡明蘇聯中亞細亞各民族底歷史問題而鬥爭」一書序言中，共匪竟指出：

「一九五〇年底真理報，一九五一年底布爾什維克雜誌又先後發表論文，揭露各種民族主義的性質的錯誤。其中間問題是對於中亞細亞合併於俄國的估價問題。由於俄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較中亞細亞先進，而且由於合併，使中亞細亞人民免遭英帝國主義奴役，所以和俄國合併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

「這次關於歷史問題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錯誤的批判，對我國（朱毛匪幫）史學工作者，同樣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在同書中又有「反對闡釋維吾兒史中的大突厥主義和大伊朗主義」一文，對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俄軍占領我伊犁，竟認爲「是同樣地既符合於俄國的利益，又符合維吾兒人民的利益」！而就在這有「很大教育意義」（正確地說「有很大腐蝕人心作用」）的書出版後不過一年，朱毛匪幫即宣佈取消新疆省制，所謂「維吾兒自治區」也跟着出現了。

由這一具體實例，世人應該更清楚地認識俄寇其匪歪曲歷史偽造歷史以割裂合併我國領土的情況。而六七年來俄寇唆使共匪在我神州大陸極力宣傳「中蘇友好」，「俄羅斯偉大」，「新愛國主義」，「愛國一家」，是其企圖完全淪我中華民族爲俄人附庸的前奏，也不待煩言了。

值得注意的是，當三十年前俄寇共匪發動「中蘇友好」及「蘇俄不是帝國主義」種種宣傳時，我國

學術界目睹蘇俄軍隊進占我蒙古庫倫的事實，曾羣起鳴鼓而攻之：民國十四年十月北京學術界因此與共匪及其同路人展開一大論戰，本冊輯錄梁啟超、丁文江、徐志摩三氏論文，就是當時的代表作；認識之正確深刻，文字之犀利有力，即在今日仍值得國人細讀。至於「故宮俄文史料引言」根據滿清康乾間（西曆一六七〇年——一七九〇年）俄國致清廷文書，比證外國資料及沙俄宮庭檔案，就俄人侵我唐努烏梁海地區史實為例，說明蘇俄較之沙俄對於國際公法及慣例更悍然無所顧忌。可以說是說明沙俄蘇俄侵略中國手段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最佳範例。而這「史料」所暴露的俄人侵我西疆的策略，更可供世人了解今日蘇俄對中央亞細亞政策藍本之所由來。

自十六世紀中葉，俄人初越烏拉山，西伯利亞和中央亞細亞就成為其占領經營的兩大目標。而從俄國強權政治眼光來看：裏海以東，阿拉海（Aral）及巴爾克什湖（Balkash）以南的一帶地區，其重要性比較整個西伯利亞還要重要得多——沙俄對於中央亞細亞之征服，雖奠基於十八世紀，但其長驅直入向中央亞細亞極力擴張卻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事。至俄共奪得政權以後，更認識中亞的重要性：除了在戰略上是一監視瞭望塔之外，並且是蘇維埃對東方各民族陳列貨色的一個窗櫺。

近二三十年來，蘇俄為加強統治中亞，曾在中亞若干地區如卡薩克斯坦、吉爾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展開所謂爭取當地人的「靈魂」鬥爭及鼓勵當地人反中國文化傳統的運動。這不僅是因為這些地區受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甚深，實際上這些地區在近二千年的歷史上可以說就是中國的屬土。「俄領西土耳其斯坦與中國在歷史上之關係」即是有關這一題目的論文之一。至於吳其玉氏兩文則是

說明俄人侵略中亞後進一步圖我新疆的史實。唇亡齒寒，實可發人猛省。

西伯利亞之落入俄人掌握，是十七世紀世界歷史上的最重要變化之一。其重要性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更加顯現了，這一廣大地區與中國關係問題是近年來我國歷史地理界熱烈研討的題材，然迄無定論。

就本書編者所知，不僅明永樂宣德兩朝在黑龍江以北（即東部西伯利亞）地區敕建奴兒干都司永寧寺石碑現被俄人竊藏海參崴博物館，即伊爾庫次克博物館中亦藏有西伯利亞各地出土的秦漢以來的中國銅鏡甚多。一九四二年蘇俄考古隊在西伯利亞雷那河（Lena R.）下游維呂城（Vilyu）發現大批青銅器如銅茅銅箭銅斧等，形式與中國周代銅器非常相像，經蘇俄考古學人斷定它是中國古代的銅器。

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五年蘇俄國立歷史博物館曾兩次在西伯利亞哈喀斯克（Khakassk）自治區——唐努烏梁海以北——的阿巴岡鎮（Abakan）左近發掘一中國漢代遺址，所得瓦片的背面多有繩痕，瓦當文字作「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天子千秋」居中，「萬歲常」在左，「樂未央」在右）。按漢代瓦文超過九字的殊為罕見，上虞羅氏著錄的瓦文字數較多的只有「延壽萬歲常與天久長」和「千秋萬世長樂未央」兩瓦。這十字瓦文的發現，實有其特殊考古價值。又俄人在這一遺址獲得青銅門環，就是古籍中所謂「鋪首」兩具，其形狀是人面有角，銅環穿鼻——按環飾用於門扉，始於漢代。惟漢代門飾歷來缺乏實證，多從漢代石刻墓碑畫像和殉葬陶器上窺見其形式，這一發現可謂之絕無僅有了。蘇俄考古隊在這一遺址四周未發現任何的地方文化遺物，因之俄人考據中國古籍，認定這一遺址是漢武帝時伐匈奴後所建房屋。

又莫斯科蘇俄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有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流出土的北朝造像甚多，銘文有曰「大將軍時□緣□爲亡兄弘國公造像」。

顯然地，這些考古發掘所得的古代實物，在證明西伯利亞地區與我國歷史淵源關係的久遠與深切上是有極大貢獻的。因此編者亟盼我國歷史地理學家研究此一問題時能更擴大利用各方面的材料——特別是俄方出版的各種資料與報告。

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我東北卽不幸成爲遠東國際糾紛的中心，而其淵源實始於十七世紀中俄人擁有西伯利亞後又得隴望蜀，企圖攫奪我黑龍江流域；幸有康熙帝予以實力打擊，遏阻俄人陰謀，保持東北安寧一百五十餘年。逮咸豐朝（一八五一——六一）俄人利用英法的炮艦政策改取僞裝友好策略以謀我，終以達到的不費一兵一彈獲得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土地之目的。蔣廷黻氏「俄人侵略東北史料評敘」可爲研究此一時期俄人行動的最佳指引；至「庚子年中俄東三省撤兵交涉經過」寫出俄人以武力占據我東北全境的實況。讀者以之與本書第二十八篇「蘇聯威脅中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一文比較參閱，一定更要讚嘆蘇俄沙俄之後先媲美青勝於藍了。

俄人之侵我蒙古，實與窺我東北同時，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會議時我卽提出明確劃定中俄在蒙古西伯利亞地區之國界，嗣因俄國要求緩議，未有結果。一七二七年布拉河會議（卽所謂恰克圖條約）雖將這一問題解決，然清廷代表多昧於地理，條約文字又未著明清晰，故我國土損失甚大，而俄人仍野心勃勃，藉口傳教經商並以越界占地及故意收容我逃人等等手段，繼續對我蒙古推行其侵略政策，至清宣統三

年（一九一一年）時機成熟，遂有嗾使外蒙「獨立」之事出現。

自民國成立以來，中俄間關於蒙古地位問題，曾數度舉行會議，而其疆界問題則久未解決；我學術界於此尤寄予極大注意與研究，「宣統三年調查之俄蒙界線圖考證」，不僅是就俄人策動外蒙「獨立」前夕我國最後一次調查當地疆界之圖說予以考證，同時對於清初以迄清末治邊政策的得失也有公允的論斷。本書輯錄此文，特別希望國人注意研究蒙古的歷史地理，以爲蒙古重回祖國懷抱作一切實準備。

當沙俄蘇俄政權交迭之際，外蒙古「獨立」運動曾一度動搖，祇可惜當時我國北京政府沒有能確實把握這一機會，以致又爲蘇俄所乘（見本冊十一、十二篇「蘇俄赤化蒙古之經過」，「外蒙共和國政府成立始末」）。民國二十五年我學界術於此得失曾展開辯論（見獨立評論第一九八、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九各號）。本書因其文字過長，不克遂錄，然而編者以爲類如此種的辯論與討論，對於學術研究以及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是有助益的，是值得有關方面注意倡導的。

蘇俄承襲沙俄侵華傳統，除繼續對我東北、西北、蒙古推行蠶食鯨吞的政治經濟侵略外，其變本加厲更勝於前的陰險手段就是假借「革命」的征服策略。一九二〇年七月共產國際通過列寧擬訂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及補充提綱），就是這一策略的指導原則。所謂與各被壓迫民族既有的政黨或革命團體合作，更爲實施這一原則的大前提。

基於此，俄共在特派人員指導組成「中國共產黨」後，又一再派員晉謁我國民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請求合作。但孫中山先生拒絕了。至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始允准原屬中共份子以其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藉使這批過去走入歧途的青年，得受三民主義的薰陶，而憬悟其錯誤，重新做人爲國民革命而努力。中山先生採取這一措施，可以說是針對列寧策略，力求操之在我以消弭中國境內共產邪說的流行，限制中共的活動。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與蘇俄特使越飛共同宣言的明白宣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更是一明快舉動，實「不啻以巨石投諸中國共產黨」。

近年中外論者對於中山先生這一措施的意義，甚少正確闡釋，且不免以今非古的錯誤；至於其匪喧騰的所謂「容共政策」更是荒謬絕倫，厚誣我國父。第一、孫越宣言發表後，蘇俄境內報紙刊物均將上錄一段主要文字刪除，越飛回國後即鬱鬱不得志，終於自殺身死。其後俄文書籍中述及孫中山先生對俄態度時均不提此一宣言。第二、當時陳獨秀領導之「中共黨史」對於中山先生允准中共分子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一事的敘述，即有「料定本黨（指中共）將因此有受其（國民黨）束縛之困難」等等文字。第三、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史達林對東方大學學生演講時於此也特別着重指出：「這是右的偏向，它包含着降低『革命』運動，並把共產份子溶化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般合唱中的危險」。第四、毛匪印行「中共歷史」中指責「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之後，於此認爲「實際上是要使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併起來，取消共產黨」。綜此四點，中山先生當時明快的措施的意義可以概見了。「揭穿共產黨滲透陰謀」一文，足以反映當時國民黨人士自始即對這批「共產份子」深具警覺的。而中山先生答復這一文字的批語說：「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吾黨……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是何等堅定的信心與決心！